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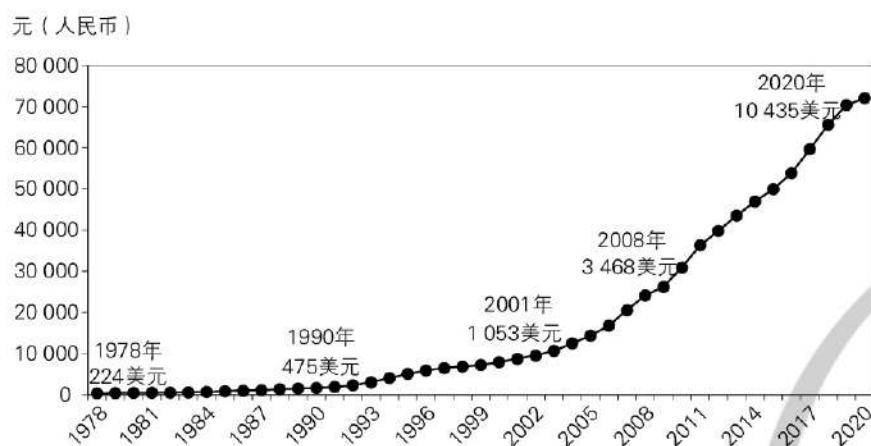
緒論

面向長期、全局、多維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經濟學

- * 大國要追求長期、全局和多維的發展。
- * 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是計劃體制、以農業人口為主體的社會和相對封閉的經濟體。
- * 轉型期，中國經濟存在偏離長期、全局和多維最優的體制性與結構性問題。
- * 市場經濟的共性是價格調節、要素流動和產權保護。
- * 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要以市場經濟的共性實現更高質量發展。

一個有著 14 億人口、幅員遼闊的東方大國，在短短數十年中，從一個以農業人口為主體的貧窮落後的國家，快速而穩健地成長為現代化國家，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均 GDP 從溫飽線迅速逼近高收入國家（見圖 0-1），這無疑是這顆藍色星球上的空前經濟奇蹟。

隨著中國國力日漸強盛，並且成為全球化的主要參與者，大家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鑑》

圖 0-1 以人民幣和美元計的中國人均 GDP（1978-2020）

都想了解中國發展的故事。這個故事要能解釋中國的成功經驗，也要能針對當前存在的體制性結構性問題，提出深化改革的路徑，避免理論上的模糊。我們要講的就是這樣一個“中國故事”。

同時，這個故事還要讓全世界都聽得明白。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與其他國家的市場經濟的共性與差異是什麼？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東方大國，那些市場經濟體制的差異，來自何處，又影響什麼？在國際交流中，這個“中國故事”要在人類共有的經濟學思想、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中國實踐之間進行對話。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形成以國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歷史的每一步是怎麼走過來的？在中國這樣一個起點獨特、規模巨大，同時區域差異也極大的大國，影響經濟增長的體制性結構性問題是如何產生的？面對新的挑戰，如何理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釋放體制性結構性紅利，推動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的、高品質的發展？如何進一步推進市場化、城市化和工業化？我們需要講述一個大國轉型的故事，一個從傳統向現代、從計劃向市場、從相對封閉向開放轉型的故事。

2002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籃球明星姚明登陸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任何人如果要寫一部姚明傳記，不會總是強調他的身高和膚色與眾不同，而一定是說他的努力和智慧如何啟示他人；同樣道理，當中國加入全球經濟的賽場，我們的“大國經濟學”也先不說中國有多特殊，而是從全人類的共同目標開始。

第一節 面向長期、全局、多維的發展

一個故事，需要一條線索。一個全世界都能聽明白的故事，就需要有一條人人都明白的線索。有了這條線索，不同國家之間就能對話、比較和互鑒了。

當代人無法選擇歷史。每個國家的體制背景和發展階段各不相同，但國家發展的理想目標是共同的：

一個國家的發展，理想的狀態是能夠實現長期、全局、多維的發展，最大化人民的福祉。

一、長期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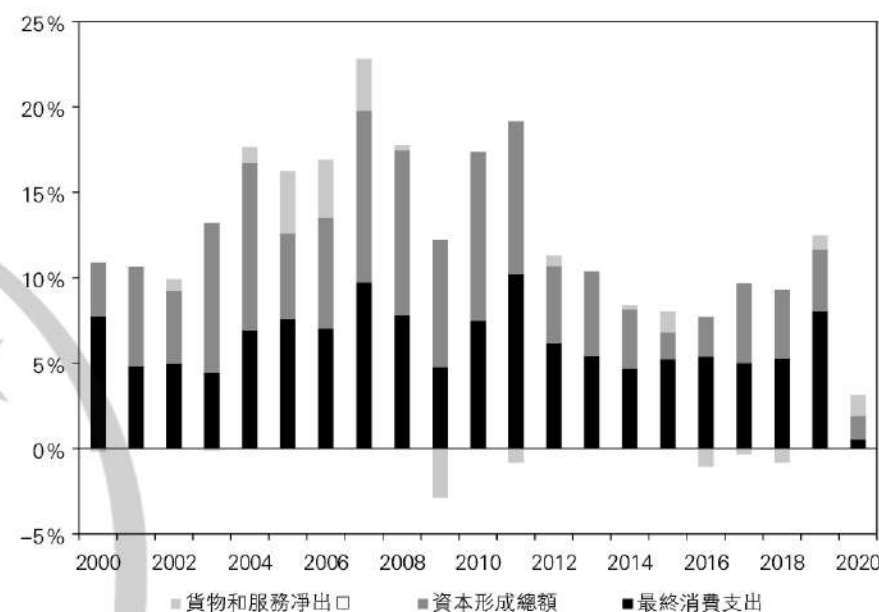
中國古話說，“欲速則不達”。一個國家要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必須令消費和投資這兩者達到合理的比例，使得經濟發展不緊不慢，不溫不火。從長時期來看，當期通過投資形成的產能，要能夠有後續的消費來消化。這種恰到好處的投資和消費結構，就是宏觀經濟學裏所說的“黃金律”。

和“黃金律”相比，有兩種狀態是不好的：一種狀態是只顧眼前消費，而不注重資本積累，結果是吃光用光，後續的經濟增長就沒了動力；另一種狀態是在當前拚命投資，雖然對當下而言，投資可以帶來經濟增長、稅收和就業，但是如果投資規模過大、增速過快，那麼當投資完成的時候，就有可能面臨消費不足的局面，產能反而過剩了。

在全球範圍內，東亞國家是比較重積累、重投資的。這件事要分兩面看，從好的角度來說，重積累有利於擴大生產，但從壞的方面來看，則容易出現消費不足而產能過剩的問題。在中國，由於長期以來重生產輕消費，出現了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投資佔GDP的比重一度超過一半。由於國內消費需求不足，於是，只能依賴出口來消化國內的產能。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國際需求萎縮，在國內便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局面。圖0-2展現了消費、投資（資本形成總額）和淨出口——通常所說的“三駕馬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近年來，隨著“去產能”的推進，投資過度和產能過剩的局面有所緩解。

除了投資與消費之間的結構關係之外，投資內部的結構也會影響短期增長和長期增長之間的關係。例如修築道路，作為物質資本積累，其特點是見效快，可以直接帶來短期的經濟增長；相比之下，用於教育、醫療、環境等方面的投資則有利於積累人力資本和



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計算

圖 0-2 “三駕馬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生態資本，更有利於長期的發展，但當下看不到直接的收益。因此，優化投資結構本身就包含了追求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含義。

專欄 鋼鐵產能過剩下的“去產能”

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在中國杭州召開。峰會公報指出，鋼鐵和其他行業的產能過剩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需要集體應對；並呼籲通過組建一個關於鋼鐵產能過剩的全

球論壇，加強信息分享與合作。2019 年 10 月，鋼鐵產能過剩全球論壇第三次部長級會議在日本東京召開。中國以真誠和合作精神參加全球鋼鐵論壇，是論壇成員中唯一設定去產能目標，並主動採取切實措施去產能的國家。2016 年以來，中國削減鋼鐵產能 1.5 億噸以上，去產能最多，是全球削減鋼鐵產能的 114%。為此，中國僅安置鋼鐵工人就達 28 萬人，超過美歐日各自鋼鐵就業總人數。^[1]

二、全局的發展

清人陳澹然曾說，“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這句話可以對應於長期的發展目標。他接著說，“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妨借來表達發展的第二個目標——全局的發展。

大國的優勢就在於統一市場，國內不同地區之間能夠實現商品的自由流通，避免小國之間的貿易壁壘。同時，一個國家內部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也能夠保證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因為人通常追求更高的收入和就業機會，企業則會追求更高的利潤。在市場經濟中，個人和企業的趨利避害不是壞事。

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尤其重要。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地區有不

同的發展條件，有的自然地理條件好，適合發展製造業和服務業，集聚更多的人口；而另外一些地方，則適合發展農業、旅遊業、自然資源相關等產業，這些產業的總產出往往受制於某種關鍵性的生產要素（如土地和自然資源總量），如果要實現人均收入提高，便需要人少一些，人均資源佔有量多一些。

因為個體是趨利避害的，會向著高收入地區遷移，最終達到“空間均衡”狀態。但現代經濟的“空間均衡”與傳統農業社會的“空間均衡”概念是不一樣的。現代經濟的空間均衡發展是人口和經濟集中在少數地區，同時，每個地區在全國的經濟總量佔比與其人口佔比大致相當，從而人均 GDP 大致相等；在農業社會，經濟活動和人口是跟著土地資源走的，因而天然分散的，更接近 GDP 總量意義上的“空間均衡”。

現代經濟是一種“空間集聚”中的“人均平衡”。在“空間均衡”狀態下，不同地區之間雖然經濟總量差異很大，但相互間存在專業化分工。一些地區承擔著引領國家現代化發展的重任，另一些地區則為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和國家安全。中央政府向相對欠發達地區提供有效的轉移支付，推進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由此，不同地區就可以共享發展成果。

三、多維的發展

人類的需求是多元的，從經濟發展初期的吃飽穿暖，到擁有自己的住房和家用電器；從享受文化旅遊等各種服務，滿足精神需

[1] 《應對全球鋼鐵產能過剩的中國擔當》，《世界金屬導報》，2019 年 12 月 10 日。

求，到重視生命財產安全，以及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空氣品質，等等。個體層面的收入水平增長和國家層面的經濟發展水平提高，都會帶來更為豐富和多元的個體需求。一個國家如果僅有經濟增長，沒有環境品質，或者收入出現巨大的不平等，都不是一個好的發展結果。如果僅僅在物質上極大的豐富，但是在文化藝術等精神層面封閉落後，也不是人民所嚮往的美好生活。

多維的發展往往和長期的發展是一致的。提升人民的教育和健康水平，以及保護生態環境等，既是為了實現多維的發展，也是為了追求長期可持續的發展。

經濟學通常用人均 GDP 來度量發展水平。從長期來看，人均 GDP 較高的國家，人類發展指數^[1]也較高，兩者並不矛盾。但是在短期裏，不同的發展目標之間卻存在著如何兼顧的難題。例如，社會可能存在短視現象，只注重經濟增長，卻破壞了生態。也有可能個體層面上獲得了好處，社會層面上卻遭到了損害，比如說有的企業只顧賺錢，卻污染了環境。有時，也可能是政府沒有充分追求多維的發展，比如說，地方政府更願意把錢花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在經濟增長方面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卻容易忽視對教育和醫療事業的投入。

一個國家如何追求長期、全局、多維的發展，這是一個公共選

[1] 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是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1990 年人文發展報告》中提出的，該指數以預期壽命、教育水平和生活品質三項為基礎變數，用以衡量各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

擇問題。每一個個體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和對於美好生活的評判。因此，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就要尋找一種政治過程來加總社會的偏好，形成一個“社會福利函數”。習近平總書記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2020 年，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週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生活過得好不好，人民群眾最有發言權。”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面對當時的國內國際環境，中國實施了不同的發展模式和經濟政策。長期、全局、多維的發展是國家發展的理想目標，在追求這個目標的過程中，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並存。這段歷程有得有失，與此同時，中國也在不斷地做出調整。

第二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改革方向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有國外學者敏銳地觀察到，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它應當有一個不同的標籤。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九大，中國明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當今世界，市場經濟是全球普遍實施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同時，各異的政治、歷史和文化特性，又使每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各具特色。在國際上，中國提出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因此，有必要讓世界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講市場經濟體制的共性，也要講中國的特殊性，但首先是共性。

一、市場經濟的共性

世界各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有一些共性，這些共性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如果離開了市場經濟的共性，很難實現不同國家市場體系的對接，還會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形成阻礙。市場經濟的共性主要有三個：

（一）價格機制調節供求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價格機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因此，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要防止一切外力，包括市場壟斷力量和政府行政干預來操控價格，這是各國市場經濟普遍遵循的原則。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例如出現市場壟斷或非理性定價，政府管控價格才是合理的。

離開了價格機制，既有可能導致市場供求失衡，也有可能出現行政凌駕於市場之上的特權，從而滋生腐敗。舉例來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曾經實施過“價格雙軌制”，在計劃價格規定的產量之外，允許企業將多生產出來的產品以市場價格出售。這在當時是一種過渡舉措，卻出現了特權階層把大量物資從“計劃軌”轉向“市場軌”高價出售的情況，即所謂“串軌”。在當前，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有助於“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社會公眾往往到市場找腐敗的根源，其實，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是最好的“防腐劑”。

（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

一個統一的國家理所應當地擁有統一的大市場，能夠暢通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國內大循環。商品自由流動能夠保證全國各地自由貿易、相互競爭；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能夠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生產要素主要包括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三種。接下來我們一一闡述。

首先來看勞動力。中國古話說，人往高處走。在“空間均衡”的道理之下，一個國家內部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既能夠提高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效率，又能夠讓人們實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同時，勞動力流動還能縮小城鄉間和地區間人均收入和生活品質的差距，有利於共同富裕。因此，勞動力流動是兼顧效率與平等的。

資本的自由流動比較容易理解。資本總是流動到最能夠獲取收益的地區、行業或者部門。個人或者企業最大化自己的資本回報，保證了資本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人們常常對資本的逐利抱有敵視的態度，這要區分具體的場景。如果資本藉助市場的壟斷力量來牟利，或者傷害消費者利益，這並不是好的市場經濟；如果資本是通過在不同地區、行業和部門之間的自由流動來獲利的，則恰恰能夠保證市場的充分競爭，避免出現資本對局部市場的壟斷。

土地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生產要素。土地本身是不可移動的，在實施土地私有制的國家，不同地區之間的用地結構差異，取決於不同地區產業結構的差異。每個地區的土地用於何種用途，取決於不同用途的相對價格，有些地方的土地更多用於製造業或服務業，同時提供與人口數量相適應的居住用地，而有些地方的土地則更多是農業和生態用地。

（三）產權的保護

市場經濟的第三個共性，是對於產權的保護。

市場經濟要解決生產什麼、為誰生產、如何生產的問題。生產者不僅要在短期裏將效率最優化，而且要在長期裏考慮未來市場需求的變化。由於市場未來的需求變化具有不確性，因此，生產者需要為此承擔風險。在市場經濟里，必須有嚴格的法律保護私有產權，讓人安心合法地掙錢，這樣才能夠有效地保障生產者的投入、努力和創新可以獲得相應的回報。

知識產權保護是目前產權保護中關注度比較高也是迫切需要完善的一種。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有利於創新發展，新產品的研發投入時期很長，投資巨大，回報卻滯後，還有可能事後才發現並不符合市場需求。只有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才能保證創新的收益。當中國進入創新驅動的發展階段，國際服務貿易也越來越多，對智慧財產權的有效保護將愈發重要。

二、中國特色特殊在哪裏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現代文明國家，追求平等和公正都是普遍的目標。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樣包含了平等與公正的內容。

平等與公正首先體現在過程上。在政治和法律層面，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並且受到法律和一系列基本制度的公正對待。

其次，平等與公正也體現在結果上。一個國家的收入差距和福利差距如果超過了一定的程度，將產生社會不滿。因此，需要在法

律和制度框架下縮小不平等，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儘管存在收入不平等，但是對於共同富裕的追求，始終是其重要的價值觀。中國已經建立了個人所得稅累進調節制度和企業所得稅制度，並且正在對財產稅進行試點。與此同時，中國也逐步建立了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制度，並努力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減少城鄉和地區間差別。此外，中國還實施著覆蓋城鄉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城市的廉租房和公租房制度。

目前，在中國的城鄉和地區之間，由於各種傳統觀念和體制的阻礙，人口的自由流動還沒有完全實現，城鄉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還很大。為了追求共同富裕，中國對收入較低的農村和相對落後的地區實施了大量扶持政策。對於曾經存在大量貧困人口的農村地區，實施了廣泛的脫貧工作，並在 2021 年全面脫貧，“三農”工作的重心由脫貧攻堅轉向鄉村振興。對於欠發達地區，除了從中央向地方的縱向財政轉移支付之外，還實施了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對口支援政策，包括經濟援助、救災援助和教育援助等，體現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地方間“橫向轉移支付”。

如上所述，世界各國的“市場經濟”有其共性，“社會主義”蘊含了中國追求平等、公正的價值觀，那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中國特色”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每一個國家的體制，都有著各自歷史傳承下來的特色。尤為重要的是，對於中國這樣人口和疆域雙重意義上的大國，存在一些影

響著經濟長期、全局、多維發展的體制，這些體制主要體現著兩層關係：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一）分權體制下地方與地方間的關係

中國是一個在經濟意義上高度分權的大國。在 1994 年分稅制改革之後，通過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劃分，中央的稅收佔比大幅度提升，但是中央的大量稅收又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返還給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支出佔了絕對多數，因此，中國在財政支出意義上是一個高度分權的國家。與此同時，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的經濟總量。在稅收之外，從 1990 年代開始，地方政府還通過轉讓土地使用權獲得收入，而土地價格又與地方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速度有關，於是，地方政府有強大的動力招商引資和發展經濟。

中國的地方間關係就是在上述分權制度框架之下形成的。每一個地方的政府都想招商引資和做大經濟規模，這是一把雙刃劍。從積極的角度來講，發展的動力激勵了地方政府努力工作，在硬體上改善基礎設施，在軟件上改善營商環境。但是也必須看到，地方政府所追求的經濟增長並不一定完全符合長期、全局、多維的發展目標，而有可能產生短期和長期、局部和全局，以及單維和多維目標之間的衝突。

對於一個地方來講，它所追求的經濟增長往往是短期的、當下的。地方政府的官員任期一屆只有五年，而實際上的任期又常常短於五年。於是，地方政府官員往往更加注重當下的投資和 GDP，相對容易忽視對長期發展有利的教育和醫療投資，對於環境保護和收入均等問題也缺乏足夠的關注。

再來看局部和全局的關係。每一個地方的發展條件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但如果各地政府都追求本地招商引資和經濟總量，就會出現各地產業結構趨同的現象。尤其是，“無工不富”這樣一個國家發展的道理，被很多地方政府當作目標，全國各地不顧各自的自然地理條件，都在大力發展製造業。從國家發展的大局來說，市場統一和地區分工極其重要，但現實中卻存在分割市場以及阻礙商品和生產要素合理流動的現象。

最後來看單維和多維的矛盾。在短期內，地方政府更加重視招商引資和經濟發展，對環境品質、收入均等以及公共服務的改善重視不夠。

專欄 公共利益與集體主義

一個社會要追求公共利益，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集體主義是相容的。

在兩個層面上，集體主義的文化是容易得到認同的。第一種是在國家層面，例如，全民支持 2008 年北京奧運會和 2022 年冬奧會的舉辦，使得全社會協調行動變得容易。第二種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特定地域層面，比如小到農村地區的宗族（或村）有其共同利益，大到一個城市或地區也有其共同利益，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集體也容易得到認同。

集體主義要發揮積極作用，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是

集體的目標如何保證理性；第二是如何為個體的努力（包括創新）提供激勵；第三，當集體主義與特定地區的身份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如何協調不同“集體”之間的利益，避免“小集體”的行為偏離全社會的利益。

（二）中央的頂層設計和協調

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客觀上要求各種生產要素能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從而有益於整個國家長期、全局、多維的發展。恰恰是因為地方政府行為的一些偏差，中央的頂層設計和協調就顯得非常重要。

1. 克服“唯 GDP 至上”。

為了破除地方政府“唯 GDP 至上”的發展觀念，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在環境保護和公共服務等方面注重民生。2006 年前後，在中央要求之下，各級政府加大了對於科、教、文、衛事業的投入。再比如，最近幾年來，在中央的要求之下，各級政府加大了對於環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在短短幾年時間裏，環境品質就得到了大幅度改善，為世人所矚目。在區域經濟發展方面，對於那些承擔著糧食主產和生態保護功能的地區，則需要通過主體功能區的戰略來避免這些地區片面地追求經濟總量。

2. 協調地方間的關係

中央還在協調地方間關係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跨界公共品的提供。比如，污染就存在著明顯的“跨界外

部性”，對於河流的上游來說，污染產業帶來的 GDP 是本地的，但是污染所帶來的成本則由下游承擔。空氣污染也是一樣的道理，工業發展帶來的產值和稅收是本地的，但是空氣污染會影響到周邊其他地區。

在制度設計上，中央層面強調河流和湖泊的全流域保護，實施跨行政轄區的河長制和湖長制；在京津冀協調發展的過程中，大量污染產業集中在河北，而造成的污染卻影響了整個華北，因此，需要適度壓縮河北污染產業的產能；在內蒙古等西部地區，曾經有一段時間沙漠化情況非常嚴峻，產生了影響華北的沙塵暴，經過很長時間的努力，這些地區加大生態保護力度，加大退耕還林和退牧還林力度，最終基本消除了華北地區的沙塵暴。

要協調好中央的統一領導與地方官員的考核，就要在短期和長期、局部和全局、單維和多維之間找到平衡點。一方面，應該看到，目標越是單一，越是在地方間存在關聯，中央的協調就越有效。舉例來說，新冠疫情期間，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各地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了。因為防疫的目標本身比較單一且明確，同時需要全國各地協調行動，如果有一個地方防疫不力，疫情就可能通過人流和物流波及其他地區。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放在全國基礎設施網絡（比如高鐵和高速公路網）的建設，以及自然災害的應對上，這些事務也是目標單一且需要地區間協調的，這種情況下特別能夠體現出中國體制的優越性。

困難的是，中央的協調如何更多地考慮不同目標之間的權衡。在這種情況下，單一目標的設計可能會帶來不如人意的結果。例如

污染防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如果簡單地追求空氣質量，那麼地方政府就有可能不顧經濟發展，大量關停被列入污染產業的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再比如去產能和保護產權的關係。中國曾經出現的產能過剩，是因為地方政府不顧自身比較優勢，紛紛加大投資。中央提出去產能的目標，這本身是對的，但是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有些地方政府不是用市場機制，根據企業的盈利狀態去淘汰落後產能，而是選擇關停一些中小型民營企業。

中央提出一個政策目標之後，地方政府往往“層層加碼”，容易造成“運動式”的政策執行，這又反過來需要中央層面及時糾錯。最近的例子是“運動式‘減碳’”：一些地區不顧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過分強調綠色低碳，甚至“一刀切”關停化石能源生產和消費企業來落實“減碳”，對此，2021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統籌有序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儘快出台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堅持全國一盤棋，糾正運動式“減碳”，先立後破，堅決遏制“兩高”（高能耗、高污染）項目盲目發展。

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過程中，既要發揮中央統一領導的協調機制的作用，又要充分發揮地方、企業及個人的積極性。如何在這兩者之間達到最佳狀態？如何避免“層層加碼”現象以及政策的波動？仍然需要不斷改革和探索。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就是解決方案之一。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包含了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信息，價格高往往是因為需求得不到供給方的滿足，在有些不宜完全由市場定價的公共服務部門（如教育和醫療），短缺也會造成人民的不滿。人民在不同地區、不同行

業、不同部門之間遷移或變換工作崗位，其實就是“用腳投票”。人民通過各種機制（包括傳媒、輿論和信訪等）表達的信息也很重要。只有充分了解來自人民群眾的訴求，才能真正做到把人民群眾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政府的奮鬥目標。

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這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要實實在在地指導改革的實踐。市場經濟是基礎，社會主義是方向，而在中國特色方面，則需要以長期、全局、多維的發展為目標，對有利的方面保持特色、發揮優勢，對不利的方面深化改革、彌補短板。

把發展目標說清楚了，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釋好了，就可以回顧歷史了。應該說，當代中國發展的偉大實踐，就是在追求長期、全局、多維的發展目標下不斷試錯、糾偏和改革的過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必須放在歷史的大視野下去理解。

第三節 轉型和發展：在歷史中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人們常說，在改革開放後的40餘年間，中國實現了別國在100年甚至200年間的發展。在這一歷程中，中國經歷了偉大的轉型，從傳統以農業人口為主體的社會轉向了現代社會，從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從相對封閉的經濟轉向了開放經濟。快速的發展本身是好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同時也出現了傳統的體制和觀念對新形勢、新階段的各種不適應。理解當代中國發展，需要有歷史的視野，把改革開放的起點講清楚，把發展的轉型特徵講清楚。